

“6.3元过一天”有何用

17日是国际消除贫困日,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和中国扶贫基金会发起“感受六块三”活动,号召公众用6.3元过一天,体验体验,增进对贫困的感受。为什么是6.3元?因为我国尚有1.28亿人生活在贫困线下,人日均收入只有6.3元。

消息传开,应者踊跃。有媒体报道了几名参与者的体验过程:车不开了坐公交;吃仁素包子权当午餐,晚餐吃碗馄饨了事,或者干脆只吃水果……就这么紧巴巴的,还差点儿越“红线”。体验者说,这下可感受到穷苦人的不易了!

有人对此举不以为然。体验到了,又能怎样?城里人过一天苦日子,对贫困人群能有什么实在用途?

要说有帮助,靠体验一把把贫困给解决了,那是忽悠。消灭贫穷是一项大工程,需要政策倾斜、资金支持,

更需要找到自主造血脱贫的路径。战胜自然条件的贫瘠,还上历史的欠账,需要政府、社会及贫困人群自身的合力,得一步一个脚印地实干。但是,过一天穷日子的体验,却有它的意义。

首先,它是让贫困人群的生活状态进入大众日常视野的尝试。随着经济的发展,消费主义在都市盛行,网上热议的是长假出国买奢侈品挤破头,电视热播的是“成功人士”住豪宅品红酒,贫困人群渐渐变得隐身化、透明化。这种“隐身”是危险的:忽视,往往是歧视、排斥的第一步,也是“仇富”心态的温床。关注困窘,扶助才能更加有力。

更重要的是,它还为换位思考提供了契机。各阶层利益诉求不尽一致,这很正常;但是,分歧如果过大,便有害无益。社会的和谐稳定依赖统筹

兼顾各阶层的利益,实现各方均受益的帕累托增进。“他大舅他二舅都是他舅,高桌子低板凳都是木头”,可大舅如果不能体谅二舅的难处,这协调和兼顾的成本就会居高不下。在传统多子女社会里,还有句俗语:要想好,大让小。已经过上不错日子的朋友,体验体验6.3元一天的生活,感受感受贫困同胞的不易,有助于形成尊重人家的权益和诉求的心理基础,这对社会的共同福祉自然有好处。

当然,一次活动,即便有用,也有限。贫困问题怎么能够更多地进入公共视野,贫困人群的权益如何能够更好地得到保障,怎样吸引更多的社会资源和力量致力于缩小差距,才是关键所在。一次网上广泛响应的体验活动,若能起到“千金买马骨”的效应,便算有功德,您说呢?

李智勇

单双号限行信息要公开 继续实施应进行听证

据报道,15日北京市交通委发布《关于2012年9月“畅通北京绿色出行月”缓解交通拥堵工作情况的报告》,提出“将评估在特定时段、特定区域实行机动车单双号限行措施的可行性”,以此作为2013年保障交通畅通措施的研究内容之一。

对于私车限行政策,从2008年出台之初就有多方质疑,如此重大的对于公众私有财产使用处分权的通告,仅仅是依据政府部门的行政命令,没有充分的法律依据,出台过程没有充分引入公众的参与,也没有人大作为代议制机关的参与和表决。

如今限行制度不仅可能延续,还要进一步扩大,对此引发的民意反弹,政府部门为维护政策的权威性和合法性,有必要在评估时充分考虑。

2008年的限行政策整体分为三部分,一是封存部分公务用车,二是按尾号限行,三是大力发展公共交通。从执行效果来看,公务用车数量至今不太明晰,封存是否有效执行不可考;公共交通有了较大发展,但还不足以满足市区便利通行的要求。只有尾号限行得以延续实施。但交通拥堵的问题作为一个系统工程,只注重落实单双号限行并不能解决问题。

经过四年的试行,北京市交管部门对限行制度的实施情况已经掌握了充分的数据和信息,应该公开。限行尤其是限行制度是否真正对缓解北京的拥堵问题做出了贡献,到底做出了多少贡献,公众尚不知情。

参考北京市政府2011年关于重大行政决策听证会的相关精神和规定,交管部门需要围绕这个问题举行公开的听证会,同时落实对重大行政决策听证会中公众参与的部分要求,邀请相关单位以及普通市民充分地参与意见表达。面对这个关系到北京五百万车主的政策,必要时还可采取网络听证等新方法,充分吸纳更广大的市民的意见,建立表达的渠道。

北京的限行制度,既可以是延续政府的闭门决策流程,也可以是开放公众参与,尝试公共决策的程序创新,而后者,无疑将为北京治理拥堵提供更科学的决策基础和更广泛的民意支持。

姚遥

曾先后担任广东省东莞市交通运输局常平分局、虎门分局局长的黄平,在任职期间,先后伙同8名下属,利用职务便利侵吞公款176万余元、受贿215万余元。这宗贪腐窝案,因黄平涉嫌强奸女下属而引发。(10月17日《法制日报》)

局长强奸女下属 牵出贪腐窝案警示啥?

阅读报道,不由想到我国的一句千古名言:“天欲其亡,必先其狂”,还有西方的一句名言:“上帝欲其灭亡,必先使其疯狂”。毫无疑问,黄平的“疯狂”程度确实令人咋舌,但也为其“灭亡”埋下了“伏笔”。

据报道,公诉机关的起诉书中提到,在2010年3月至2011年4月期间,黄平利用上下级权属关系长期威逼女下属多次与其发生性关系。这名女下属结婚7年一直没有怀孕。突然有一天,女下属的丈夫发现妻子怀孕7个月,莫名其妙地要做父亲了,再三逼问之下,女下属讲出了与黄平的情事。女下属的丈夫找到黄平理论,并将其头打破。双方协商不成,女下属的丈夫报警。去年11月22日,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并刑事拘留黄平。12月6日,黄平正式因涉嫌强奸女下属被东莞市第二市区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该案在移交检察机关审查起诉阶段,检察机关在调查发现了黄平在内的9名东莞交通系统工作人员存在贪腐问题,于是,这宗贪腐窝案大白天下。

由此可见,先“疯狂”后“灭亡”,虽然不能归功于“上帝”,但也恰恰说明了“多行不义必自毙”,是一条铁的定律,任何人都没法改变。

然而,掩卷沉思,心中并没有对这宗贪腐窝案的受审而生发快感。可以说,受贿贪污、白占干股、设小金库、强奸女下属,黄平被控多罪,件件都令人恨之入骨。那么,为什么没有人发现?没有人举报呢?特别是这名女下属在长期威逼之下多次与其发生性关系,假如没有“意外”怀孕7个月,假如女下属的丈夫对结婚7年一直没有怀孕的妻子“意外”怀孕,“喜出望外”而不去再三逼问其“来源”,恐怕这宗贪腐窝案还会继续“窝藏”下去,而强奸女下属的“疯狂”也会继续上演,等待着“灭亡”。

正因如此,笔者认为,无论从哪个角度上说,“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莫伸手,伸手必被捉”,这是多少落马贪官验证过的“真理”,黄平和他贪腐窝案的成员注定是逃不过这一劫的。因为“伸手必被捉”毕竟还不是“伸手”即“被捉”,对“伸手”者的查处往往会有一个过程,就像“纸里包不住火,雪里埋不住死孩子”一样,天长日久总有一天会水落石出,总有一天会原形毕露的,在这一点上,是毋庸置疑的。

但是,此案所暴露出来的“监督”缺位,不能不让人震惊。“黄平式的疯狂”再次表明:只要手中有权,不论职位高低,监督机制缺位,自律素养乏力,腐败现象自然会像“胖大海”一样膨胀。因此,只有上紧“监督”的条发,增强监督的权威性和有效性,从制度上、从管理上、从源头上扎紧“篱笆”,堵塞“贪腐”漏洞,确保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才能让“黄平式的疯狂”无处上演。

林伟



密码之晕

银行卡密码、保险柜密码、QQ密码、电脑密码……因总担心记不住,牟女士将生活中的所有密码都记录在一个小本子上,总随身携带,但有一天她外出购物回来发现,密码本丢在了的士上,当街狂躁得晕厥过去。街坊急忙将其送医院急救。(据《武汉晨报》)

文/小正 图/春鸣

在神话传说中,密码、符咒等都是验证正身,打开宝库的钥匙,如《一千零一夜》中,只要一念“芝麻开门”的咒语,藏宝的大山便轰然洞开。在现实中,以往密码使用并不常见,寻常百姓,有几把钥匙足矣。

但如今,密码使用之多之滥,几成一灾,除了五花八门的卡之外,进门、上电脑、QQ等也都离不开密码。密码不仅成了通行证,也成了累赘以至枷锁。百姓身揣“密码本”本已称奇,而丢了密码本竟至昏厥,更可谓现代

社会之“浮世绘”。其实,欲解密码之焦虑症,关键还在设密本人。现代人本不该为密码所累,而应趋利避害,既借用科技之利,又降低对其过度依赖的风险。

“捡30万金条不吱声”凸显银行冷漠

丢了价值30万元的金条,焦急之下遇到了两种态度。民警牺牲休息时间,查遍全程监控录像;相反,捡到金条的银行却不急着,等着失主上门。“他们倒是报个警啊,也不至于我发疯似的四处找!”原来,高女士在沈阳市一家银行存款时,金条遗落在银行的一角,被一位大娘捡到,当时就交给了银行员工。高女士对银行的所作所为有些不理解。“8日捡到金条,为啥到10日还不报案?”(10月16日新华网)

从道义上,捡到如此贵重的物品,拾拾者有尽快报警和上缴的义务,这不仅是为遗失者分忧解难的义务,也是避免陷自己于不义的自觉。瓜田李下,这家银行应该知道,“捡30万金条不吱声”会给人造成误会却漠然置之,说明其对自身形象基本不在乎;多日不报警,直到警方和失主找上门了才承认,和老大娘拾金不昧行为相比,差距不是一般的大。这样的银行用“无德”来形容丝毫不为过。

今年9月7日,南京市民丁先生到一银行的自助区存款,因操作失误,一万元被ATM机吞了,当即联系银行客服,被告之要等两个工作日才能处理好。报警求助也无果,便想出一招,换个电话致电客服,假称机器多吐3000元,5分钟后客服便赶到了。(9月9日《扬子晚报》)“一吞一吐”间的天差地别,可见银行将自己的利益看得多重,

将消费者的利益看得多轻。网友总结:ATM取出假钱——银行无责;网上银行被盗——储户的责任;银行多给了钱——储户义务归还;银行少给了钱——离柜概不负责;ATM出现故障少给钱——储户自认倒霉;ATM出现故障多给钱——储户涉嫌盗窃……所有这些无一不暴露出银行很强势、储户权益极度弱势的尴尬现实。

美国商业银行最多时有一万多家,现在也有好几千家。而我国银行,数量屈指可数,竞争不充分,就使得银行变成了一个“大爷”。所以,改变银行的服务态度,关键在于降低银行业准入门槛,培养更多的市场竞争者。

毕晓哲

该学习新加坡整治垃圾短信

对于新加坡严惩垃圾短信的做法,不少网友表示“羡慕嫉妒恨”,希望能好好向新加坡学习。这样的民间反应折射出公众对垃圾短信的厌恶之情,也表明我国对于垃圾短信的整治工作并不令人满意。

形形色色的垃圾短信令人不胜其烦,这是公众最直观的感受。而若更深入地探讨垃圾短信的实质,则其同隐私权乃至信息安全等紧密相连。诚如新加坡新闻、通讯及艺术部长雅国所言,新法案将增强新加坡作为区域信息处理枢纽的竞争力,也有利于缓解个人信息滥用给新加坡人造成的困扰。在数字化生存时代,能否建立起规范的信息传播秩序,确保信息安全,甚至关乎一个国家的竞争力和未来。

但就我国眼下的情况来看,对于新加坡国会近日通过了个人信息保护法,禁止向个人发送垃圾短信等垃圾信息,违法发送垃圾信息的机构或个人可能会被重罚100万新元,约合514万元人民币,每条最高1万新元,约合人民币5万多元。同时,新加坡政府将成立个人信息保护署,负责处理这一法案的相关事宜。

名单基本都是省领导、市领导等级别的人,原告能受此等待遇,可看出我们的诚意!”如此说来,电信运营商不能控制垃圾短信,为何垃圾短信依然泛滥?个中原因令人浮想联翩。今年的央视“3·15”晚会亦曝光了中国电信为垃圾短信大开方便之门,并借此敛财的情况,但即便如此,垃圾短信依然泛滥成灾。

新加坡的严厉措施学起来并不难,难的是拿出像人家一样整治垃圾短信的态度,难的是拿出“打老虎”的决心。若不肯放弃一个“利”字,若不肯为民生向强势利益集团叫板,那么人家的东西再好也是人家的。就算被迫出台了一些看似严厉的措施,最终也会在执行中走样,公众收到的垃圾短信,一条也不会少。

晶晶

人社部劳动工资研究所日前发布的2011年《中国薪酬发展报告》透露,我国部分行业工资过高导致拉大收入差距。有的行业员工平均工资收入达到当年城镇单位企业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的10倍,有的高管年薪已经达到当年全国企业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的2000多倍,相当于农民工平均工资的4000多倍。

高管年薪达民工数千倍 应正视收入鸿沟

如此大的鸿沟令人不安。因经济增长而扩大的“蛋糕”,并非等而食之才合理。对企业和社会贡献率的大小,以及不同行业和工种天然存在的差异,决定了工资收入的差异性,这其实是人力资源的合理价格配置。但是,当收入差距已然失衡到数以10倍、千倍时,这表明人力资源价格配置的失衡,表明经济增长成果的分配不均。

更需要担心的是,收入差距鸿沟的形成,并不完全是行业以及个人竞争力强弱所决定的,而是资源占有有多寡在起作用。比如,许多垄断型行业和企业的收入回报率较高,是基于行政式资源垄断的地位及超强的谈判能力。而高管收入增长过快,则来自其自行议价的权力。

这是需要通过机制建设加以监管和控制的“特权”。一方面,因“特权”形成的收入差距,起着负面的激励导向作用,它鼓励的是非竞争性的、非市场化的;另一方面,收入差距过大在消费上起着抑制消费作用。过高收入者基数小且已完成基本消费,而基数庞大的低收入者则难以提高消费能力,这对扩大消费内需的调控目标具有极大杀伤力。

长期以来,收入分配差距就是社会焦点,为公众瞩目。对收入差距鸿沟不能视而不见。好在,这正是政策面要调整的重点所在:“限高、扩中、提低”的收入改革方向早已确立,收入分配改革方案也将于近期出台。

收入分配改革,需要以问题突出的领域为切入点。比如,对于行政垄断型行业和企业以及高管,应当有所限制。同时,需要认识到,垄断型行业和企业的高收入,属于对全民资源的自行处置,这与充分竞争型企业形成的收入格局完全不同。此外,需要进一步加大对于低收入群体的分配倾斜。这其中,既包括对于低收入者实施更大力度的财政补贴,也包括对于中等收入群体建立工资增长刚性机制,减轻其应税负担。

在改革一次分配的同时,对于二次分配也需要加以改革,以扩大收入来源。正视收入差距并加以改革,并非“不患寡而患不均”,而是出于优化经济增长环境和社会结构的需要。这是未来发展必须夯实的基石。

迹晓

被称为“史上最长黄金周”的中秋、国庆假期刚过,某世界知名办公方案提供商发布了它的最新调查结果:中国内地上班族在过去一年内所承受的压力,位列全球第一。至于压力到底来自于哪里?统计显示,“工作”、“个人经济状况”、“来自老板的压力”排在前三位。此外,《生命时报》的一项调查也表明,所有受访白领中,仅12.28%的人认为自己完全健康,超过四成人觉得自己处于“亚健康”状态。

谁造成了中国上班族压力世界第一

国人“亚历山大”,即便没有量化的数据支持,也不缺真情实感的体验。“内地上班族过去一年所受压力全球第一”,此一结论也许并不精准,但至少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我们的生活状态。坊间感叹良久,“脚下这方土地,位处一个高压社会。”焦虑、迷惘,缺乏安全感,对未来少有稳定预期……凡此种种,有见于拥挤的马路,有见于疲惫的车厢,更见于上班族的言行倦怠。

“压力第一”的结论,或重要无比,或无甚所谓。毕竟,抱持宏观论视角,整体上升的社会期内,“压力”也即动力;一方面,拼搏、向上的浮士德精神,是此阶段奉行的主流价值观;另一方面,这个时期的福利法则,渐从“个体对个体负责”变成“社会对个体负责”。由此,有压力的生活,恰是有希望的生活:你能触到梦想边缘,但先须跨越一段坎坷。

现代人的精神困境,就在于他们试图挣脱旧有的生活范式,却无法承受奔向“新生活”所要支付的身心成本。某种意义上,“上班族的压力”,同样是基于效率、公平的筛选机制——顶住压力者向上流动,反之则反!空叹“压力大”,几乎毫无价值。重要的是,个人如何以科学的方式自我调适?全社会如何避免上班族的“勤奋”时变成一场集体的“精神自戕”?

人际竞争,固然是城市的活力之源;但,一旦“竞争”突破人性的底线,便在酝酿危机。所谓“全球第一的压力”,无疑是“过度竞争”的后果。可惜的是,“上班族”无意识、无能力,消化此类负面的压力:根据民调,旅行、购物、上网等,是国人泄压的主要方式。但,集中、单一的休假模式,注定了“上班族的旅行时间有限、品质堪忧;至于购物、上网等释压选择,意图以物质刺激、虚拟世界填补心灵缺失,更是饮鸩止渴之举。”

处处“加压”,无处“解压”,才是“高压社会”的尴尬。市场供给层面,心理干预、情绪护理等行业,尚且未能充分发育;而公共服务层面,卫生机构仍不曾建构起,完善的心理健康监测、疗治体系。“不累倒不休息”的职场文化中,工作狂式的“强人”,竟成被推崇的偶像。毋庸讳言,这种逻辑有些病态,也有些无奈。“玩命干活”的人群,并未被传授,对冲压力的技巧。

以“压力”为内核,城市的苛刻竞争和筛选,得以持续不断的展开。人口红利期、社会上升阶段,企业就是这般的“优待”。只是,社会的治理机构,总不该任由过度竞争、负面压力继续爆棚。众所周知,它们悖于抽象的正义,且潜在隐患多多。

蒋景景